

文学现象 与文学史风景

逢增玉 ◎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逢增玉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 - 7 - 100 - 07541 - 1

I. ①文… II. ①逢…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305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

逢增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41 - 1

2011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0 3/4

定价: 55.00 元

目录Contents

自序 1

上编 现当代文学现象阐释与总体观照

第一章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质疑现代性主题与叙事 17

1. 乡村社会和文明的美化与乐园世界的构建 18
2. 对都市及其文明的文学化批判 22
3. 文明对比中的逃离与回归 26

第二章 现代文学叙事中的空间意象与叙述模式 34

1. 近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空间观念的形成与嬗变 34
2. 启蒙主义文学叙事中的乡村中国形象 37
3. 革命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空间意象与意义 42
4. 多样化的都市想象与叙事 47

第三章 现代启蒙文学叙事中的现代性 54

1. 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历史生成与逻辑 54
2. 现代性在鲁迅小说叙事形式中的转化与积淀 57
3. “鲁迅风”与乡土文学叙事模式的现代性话语 62
4. 现代性话语和叙事模式的延续与泛化 66

第四章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医学”意象和意义 70

1. 历史语境与近现代文学的“医学”意象 70

2. 救亡文学对医学的“借喻” 72
3. 启蒙文学中的医学隐喻 79
4. “医学”隐喻的文学与审美价值 88

第五章 试论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 95

1. 不安定的灵魂——20 世纪 20 年代的流浪汉小说 95
2. 大地之子——20 世纪 30 年代流浪汉小说 100
3. 终极关怀——20 世纪 40 年代流浪汉小说 104

第六章 流派与空间视阈中的文学史现象 109

1. 20 世纪 30 年代的“论语派”和“论语八仙” 109
2. 现代文学中的“沙龙”现象 113
3. 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形象 125

第七章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牢狱”文学的叙事倾向 130

1. “牢狱文学”产生的原因及文学命名 130
2. “牢狱文学”的现实影射与叙事指向 134
3. “牢狱文学”的隐喻化叙事 140
4. “牢狱文学”的叙事格调与结构模式 145

第八章 20 世纪 90 年代“抗战文学”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诉求 152

1. “历史记忆”和历史真实的个人化重构与叙述 154
2. 《生死场》上的生存抉择与历史记忆的理性诉求 159
3. 历史记忆引起的现实言说与超越历史的文化反思 164

第九章 中西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史重述

——进化论的理论预设与胡适的文学观 169

1. 分割传统：胡适的文学史重构 169

2. 与西方对接：新文学创造的外部资源 173

3. 弥合裂痕：文学史叙事的文化姿态 178

第十章 对左联和左翼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183

1. 重视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范围的拓展 183

2. 注重对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深度研究 185

3. 注意对左联作为一个政治化的文学团体的内在差异性的研究 188

4. 注重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的研究 192

第十一章 左翼文学研究冷热现象的审视与反思 195

1. 左翼文学研究热度再现的多维因素 195

2. 左翼文学的品格与作为精神资源的价值 202

3. 左翼文学的缺失与研究的态度 206

第十二章 “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 213

1. 古代“志怪”与“传奇”小说的基本特征 213

2. “志怪”“传奇”传统与鲁迅小说创作 215

3. 沈从文与张爱玲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218

4. 左翼文学的政治与革命“传奇” 223

第十三章 东亚病夫、醒狮与涅槃凤凰

——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传播 227

1. 近现代“中国形象”出现与嬗变的原因 227

2. 负面的中国形象——破船、陆沉与东亚病夫 229

3. 正面的中国形象——醒狮、少年中国与涅槃凤凰 236

第十四章 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 244

1. 现代文学对进城农民的书写 244

2. 新时期“农民工”文学的复杂内涵与咏叹 249

3. 乡村女性的城市挣扎与悲歌 254

第十五章 论“新边塞文学”的革命性与现代性叙事 262

1. 何为“新边塞文学” 262

2. “新边塞文学”的革命性与现代性 264

3. “新边塞文学”的浪漫性与现代性 267

4. “新边塞文学”的叙事模式与现代性 271

第十六章 动机的善良与装置的不当

——《中国人的素质》的正与误及其与启蒙和民族主义的关系 277

1. 批判与赞扬：对中国及其人民的两种评价 277

2. 装置的不当与观察的失误 282

3. 对误读的误读及原因 289

第十七章 中国与亚洲启蒙中的文学 294

1. 文学与启蒙的关系 294

2. 文学在启蒙中的作用 299

3. 文学自身在启蒙中的蜕变 301

下编 重读经典与历史阐释

第十八章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问题的再思索 307

1. 回到历史语境：辛亥革命性质与意义的再思考 307

2. 回到文学语境：鲁迅小说对辛亥革命描写的再解读 312

第十九章 鲁迅小说中的非对话性与失语现象 319

1. 鲁迅小说的对话性与非对话性及其深因 319

2. 两个世界的鸿沟：启蒙者与落后人民的对话中断 …… 322

3. 无所不在的隔膜与失语 …… 331

第二十章 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 …… 336

1. “立人”与启蒙的诉求高喊与质疑 …… 336

2. 进化的呼唤与颠覆进化的叙事 …… 341

3. 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发现”与现代性的困境 …… 344

第二十一章 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诉求及其悖论

——以鲁迅的《故乡》为中心 …… 350

1. “乡村与故乡风景”中的启蒙话语与诉求 …… 350

2. 两个乡村世界的存在及其对启蒙话语的颠覆 …… 355

3. 两个乡村世界与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 …… 358

第二十二章 鲁迅若干思想和文学话语探源与比较 …… 364

1. “庸众”、“看客”和“反民主”思想与苏格拉底的关系 …… 364

2. “豆腐西施”的由来 …… 367

3. “历史双向性现象”与句型的“原典” …… 369

4. 鲁迅与胡适的“监狱认识” …… 372

第二十三章 《子夜》的叙事倾向和文学价值的再认识 …… 376

1. 《子夜》价值倾向的复杂性、合理性与多种阐释的合理性 …… 376

2. 凸现于历史与文学语境中的局限与失误 …… 382

第二十四章 茅盾的矛盾

——思想史视野中的茅盾小说 …… 387

1. 茅盾小说中的时代女性与“五四”启蒙的关系 …… 387

2. 茅盾小说中民族资产阶级形象描绘的独特价值 …… 391

3. 民族资产阶级形象与启蒙的历史和文学思考	395
------------------------------	-----

第二十五章 闻一多思想精神及其阐释的若干问题 401

1. 闻一多与国家主义问题	401
2. 闻一多与马克思主义及“反俄”问题	406
3. 闻一多的思想发展历程问题	413
4. 闻一多前后期的民主思想问题	417

第二十六章 重读《荷花淀》

——民族战争环境中的节烈与传统道德的合理性问题	424
-------------------------------	-----

第二十七章 女人是祸水？

——对虎妞形象及其与祥子关系的再思考	434
--------------------------	-----

第二十八章 新的小说的诞生？

——试论丁玲小说《水》与左翼文学规范的关系	444
-----------------------------	-----

第二十九章 咖啡店里的风花雪月

——《咖啡店之一夜》与都市文化及其他	462
--------------------------	-----

第三十章 乱世尘缘中的超俗入圣

——许地山小说《春桃》新解	473
---------------------	-----

后记 481

自序

—

这几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给研究生开设了两门主修课程：一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研究”；一门是“文学史方法论与现代文学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写的一些研究论文，都着力发掘和阐述现当代文学中存在的但又为一般的现当代文学史不予关注或关注较少的现象，像东北流亡文学、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20世纪30年代左翼“牢狱”小说与文学、现代小说中的“志怪”与“传奇”、现代文学中的“医学”隐喻与叙事等。这些现象被学界接受并被后来的研究者借鉴与引申开来，其中，有些现象是我第一次提出或命名的，像1989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论述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的论文，这个现象和命题后来被延伸和扩大为漂泊者文学。我关于中国现代小说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诗骚与史传传统，也继承了“志怪”与“传奇”传统的观点，也被认同和接受，我的一个博士据此写成了专著，我还为他作了序言。2003年“非典”时期，我写了鲁迅小说中的医学隐喻的论文，后来见到也有人对此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也有些现象，如20世纪30年代左翼的“牢狱”小说，当时的批评家周立波在一篇年度评论中已经提出，但没有深入阐述，同

时论述的范围比较窄，我则受他的启示，在他阐述的基础上将“牢狱”小说的内涵和边界进行更广泛的开掘与延伸。

我之所以注重对现当代文学现象的研究，其实是与对文学史的长期关注和思考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不是很长，但现代文学史的观念，研究和写作文学史的方法变动很大，或者说一直处于变动中。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读大学期间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兴趣。我所在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研室曾经有穆木天、吴伯箫、张毕来、舒群、萧军、王治之、蒋锡金、李辉英等人任教，他们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与运动的在场者和参与者，张毕来先生还是20世纪50年代一部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纲》的作者。但是，我们读大学时使用的各高校自己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由于时代和意识形态所限，要么疏漏了很多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要么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价存在过强的政治色彩，与我们私下阅读某些作家作品后的感觉很不一样。比如，那时使用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不讲沈从文与周作人，但我们在图书馆看到了1949年以前出版的沈从文小说与周作人的散文，而且沈从文的《边城》还是初版本，读起来感觉很好；还有梁实秋，教材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文艺论论争中提到并一直作为批判对象，我们也是在图书馆看到了他1949年以前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一位同学因为喜欢就“黑心”地没有归还而是任凭图书馆罚款（按照书上大洋几角的标价罚款两倍）。这种行为并不高尚，只是想借此说明在那读书若渴的年代，读到那些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时的欣喜之情，也借以说明文学史教材对文学史现象取舍的失衡。在我们大学毕业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陆续出版或重版。在学校港台阅览室也能看到美国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司马长风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台湾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等。通过对

这些文学史著作的阅读，我看到它们不仅收录与描述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存在很大不同，而且收录与评价的标准和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与方法，更存在显著差异。这样的差异引起我们几个对现代文学深感兴趣者的思考：面对同一段历史，为什么存在如此不同的认识与评价标准？它们何者为真？或者说何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原生态”，应该怎样进入“次生态”的文学史？“次生态”的文学史与“原生态”的历史状态之间应该构筑怎样的历史与认识的联系？建构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应该怎样？一言以蔽之，到底应该如何写文学史？

带着当时自己还不能解决的思考与困惑，大学毕业后，我走进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其时，这样的思考远非一两个人的，而是普遍存在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在思想解放、走向世界的宏阔时代氛围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出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呼吁与倡导，在呼吁与倡导的同时，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南北两方的学者开始新的文学史写作。并且开始悄悄地收获：南北学者陆续在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散文史和现代批评史、现代和当代文学史、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等方面推出新的成果，在材料、观念、方法和结构上都各自有所创新和开拓。文学史写作的新变化不仅来自文学学科自身的求变和拓展，也来自哲学、史学和域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和撞击。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史景迁和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等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中体现出的观念与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和现当代文学的美籍华人夏志清、李欧梵等人的著述，都在被借鉴中促使国内学者在整体性的文学史、特殊性的专门史和将宏观寓于微观的年度史方面不断拓展，使文学史写作既热闹而又扎实地前进，出现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这样一批在文学史观念、方法、结构与边界等方面都有所拓展的成果的出现，促使我对文学史写作的有关问题更加关注。在对文学史研

究成果的阅读和思考中，一方面，感到这些成果垫高了文学史和学科研究的水平，对我个人和学界都产生了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些经过长期播种、耕耘收获的精神花朵和果实，也还存在不尽完满之处。当然，这也是文学史写作的永恒困境和挑战——任何文学史都难得完满，后继者总是会由于不满意而不断地提出“重写”的要求并付诸实践。因此，文学史的结构序列总是在发生变化，在相对的稳定与常态和不断变化中保持动态平衡。我自己没有参与文学史的重写，但对文学史问题的长期关注，以及看到的文学史写作的成就和不足，促使我想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文学史问题的思考，那就是，先搁置文学史写作中的那些具体的又是艰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尽量回到历史现场和过程中去关注和剖析现象，通过对显在的或被遮蔽的文学史现象的发掘与分析，揭示现象中蕴涵的类似于规律的东西；或者说，构成文学史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往往存在于现象的丰富性中，在丰富或复杂的现象的展示与连接中，历史的动态和过程自会呈现出来。从表面上看，这些现象的展示和分析不是结构严谨的文学史，但文学史就奠基于丰富的现象中。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文学史重写的参与，是现象的文学史。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近几年的研究，才有意更多地发掘和剖析文学史中的一些独特现象，希望在现象和文学史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

二

任何文学史写作其实都有述史模式的选择和确定问题。我们知道，历史的“原生态”是非常宏大和复杂的，任何希望还原历史“原生态”的历史写作实质都是做不到的，因为第一不可能，第二没有必要。作为“次生态”的历史著作都是后人对历史“原生态”进行选择取舍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美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的话是对的：任

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每个时代的当代人对此前的历史进行选择、剪裁和加工的结果。而每个时代写作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影响和建构的当代性与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及其差异自然会带来历史撰述者的述史模式的差异，从而导致“原生态”的历史在不同史学家的撰述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规律。这就像量子物理学所讲的量子的波粒二象性：作为基本粒子的量子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具有波与粒子的两种性状即波粒二象性，它何时为波，何时为粒子是随机性的，同时也取决于观测者的主体性观测。观测者对波粒二象性的随机呈现具有观测时间和方法的主体性干预作用，可能在某个观测者、某段观测时间里呈现为光波，在另外的观测者和时间段里则可能呈现为粒子，测不准成为基本的现象和原理。这样，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就不是固定和唯一的。量子的波粒二象性提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历史写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或同一性。由此，导致历史写作的第一个困境或二律背反是：“原生态”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也希望知道和掌握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但人的主观条件和认知能力又不可能穷尽和呈现全部历史，历史会在不同的历史探究者面前显露出不同的现象和面貌，人们接触和进入历史时接触、看到和掌握的只能是历史“原生态”的一部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存在种种主体性的历史观察者和撰述者写作和构建的历史又是必然带有主观性和建构性，难以完全客观的；历史是宏大和整体性的，但被书写出来的历史又只能是历史的局部，难以尽呈全貌。这是历史写作中的永恒性困境和难题。

文学史作为历史之一种，其写作除了一般历史写作都面临的共同难题之外，还存在文学史特有的困惑。文学史，顾名思义，就是文学的历史。首先，历史写作尽量追求客观、理性与规律，在 20 世纪以前，人们一般认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历史学是最接近科学的。而文学却是追求感性、个性和差异的，是最没有成规的，越是伟大的

作家作品越是具有卓异的个性，越是突破常规。其实，即便是一般认为的某个流派或属于某种创作方法的作家和诗人，彼此间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远远超越一致性，或者只具有表面的同一性。用某个概念和范畴去描述和概括具体的作家与作品，往往捉襟见肘。其次，我们一般强调历史是发展的，人类社会就经历了从古至今的发展进化历程，历史就是对这个过程的描绘；由此而言，文学也经历了由古而今的发展过程。但是文学的发展又不像某些物质器具那样具有显著的进步与进化，比如远古的青铜器到今天的电脑，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工具进步的程度极其明显。而文学，虽然从古至今的书写工具也发生极大变化，但文学的内容、体裁、文类、精神内涵和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并不能简单地与时代画等号。就像艺术一样，不能说今天的国画超过了古人的山水画。毕加索的那些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绘画，其灵感反倒来源于远古人类刻画于山洞中的岩石壁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为例，说明人类某个时期，特别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某些文学类型和文本，可能是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峰和范本。文学史却必须描述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同样给文学史写作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弄不好，就会把有演变却未必有进步的文学发展写成不断进步与进化的过程。最后，历史写作追求相对恒定与稳定，而文学却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当代文学作为没有完成的过程，一般是不宜写史的。即便是过去的文学，作为已经凝固了的历史存在，不再变化，也会由于浩瀚的“原生态”历史中的新材料与资料的不断出现与发现，而极大地改变文学史原有的结构与秩序，甚至会颠覆固有秩序。文学史写作者的主体性也经常发生改变，如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性别观、时代思潮、知识与认知结构等变化，都会导致对固有的文学与作家的等级、地位、价值和评价的变化，并同样由此给文学史结构序列带来冲击，造成迭代不休的重写文学史的要求。

上述这些因素，都造成文学史写作的困难和挑战，就像中外古今的美学研究，尽管出现众多大师和佳作，美学的诸多领域都被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美”的定义莫衷一是，只能得出“美是难的”的命题一样。文学史写作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已经出现和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但文学史书写仍然是难的。在一定意义上，文学是不太适合写史的。不过，为了把握与了解文学的历史和过程，为了文学知识与传统的继承与生产，人类又需要从既有的资料和认知条件出发去撰写文学史。文学史就是在不可克服的困境和超越困境的努力中被不断地书写和再书写，而这不断书写和再书写的努力与过程，颇有点像古希腊的西绪弗斯神话，不断地推着巨石上山却永远到达不了山顶。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可能也是文学史写作的动力和乐趣。世界、知识、真理、规律是不可穷尽的，人类永远不会一劳永逸地到达知识与真理的顶峰和终点——从哲学上看，不可知论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是，世界、知识和真理的无限性与人类生命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不会只导致无所事事的不可知论。相反，以有限搏无限倒是人类在二律背反困境中的永恒追求和宿命。正是这种追求和宿命，推动人类文明与文化不断发展与创新，使世界和人类发展到今天。文学史的写作也是这样。正是因为存在如此的困境和难题，才构成了挑战与挑战的动力和乐趣，促使文学史结构与秩序不断颠覆与重构，新的文学史不断出现。文学史不仅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文学的历史状貌与流变过程，也反映了主体性的人类知识生产和认识能力的变化与水平。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看法是对的，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书写，只能写出历史的大约数，而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文学史这种力求稳定、完美、全貌和揭示规律而实际上又难以达到永恒书写的困境和矛盾，以及人类力图走出与打破困境的努力，又恰恰是文学史书写的永恒诱惑和魅力。

三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和研究，似乎受到冷落和来自学科内外的压力。我以为，现代文学暨 20 世纪中国文学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化、凝固化了的客观存在，因而现在可以以一种“时过境迁”的冷静、客观和科学态度来进行审视，进行经典化的筛选与处理，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能不看到，在历史化、经典化和客观化之下，人们对现代文学存在着两种态度或曰心态：一种来自现代文学学科之外，包括新儒家、某些作家和语文教育界的部分人士。他们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无是处，偏激者甚至指摘“五四”以来没有一篇好文章。另一种来自学科之内，是在对现代文学经典化和客观化的浪潮中多少存在或者隐含的心态：对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比较短暂的历史过程所能取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认定存在着某种自我怀疑乃至“自贬”。比如总是想到和谈到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现代文学所占的篇幅和地位问题，一种流行的、既成的观念似乎已成不易之论：现代文学的精品经典不多，很多作品只有认识价值没有审美价值；总是以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为参照标准来衡量现代文学，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受新儒家和“国学中心论”的影响，以“经”、“圣”的观念“仰视”国学而将现代文学排除在外，甚至以隐含的类似传统文学将小说戏曲看成难登大雅之堂的下品俗品的观念和心态对待现代文学。由此出发，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某种“中年心态”，一种类似钱玄同等人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心态、学术兴趣和文化人格的变化。这种“自贬”心态有时与学科外的越来越严重的对现代文学的“他贬”贯通在一起，形成了对现代文学研究的“窄化”以及程度不同的学术偏见，造成了一定的学术语境压力。

这种“自贬”心态和“窄化”倾向，直接影响着对新文学的价值认定，从而影响到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我认为，在 21

世纪的今天谈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首先应当去掉“自贬”心态和排除“他贬”的干扰，既不自傲也不妄自菲薄，面对全部的历史资料，以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对现代文学进行价值认定和界定，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文学的学术化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因为说到底，文学史观念和研究以及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体例、内容等，都离不开对文学史的价值界定。如果认为研究的对象毫无价值，那何必去研究？所以排除“自贬”心态和“他贬”倾向的干扰，对确立科学的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和由此而来的文学史研究与编撰，都是十分必要的。

充分认识和肯定现代文学的贡献和相应的成就，是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认定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我们应该既理直气壮又实事求是地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价值、艺术诗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研究，并编撰出相应的文学史。所谓文化的或文化价值论的文学史，是从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和体现出的文化形态、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和阐述。“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所提出、表现和高扬的科学民主、文明进步、人权人道、生命尊重等，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是传统文化所没有并且不会自发出现的。它们是一套全新的文化概念、文化体系和范畴，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巨大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不仅划分了中国文化史的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而且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资源，形成了新的文化和“国学”传统，成为中国文化最有活力和生气的部分，是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本质规律。从这种文化价值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就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命题和内容作出新的发现与阐述。

所谓的艺术诗学与审美价值论的文学史，也是出于排除了“自贬”心态后的价值认定，即现代文学史不仅只有认识价值，也有诗学和美学价值。鲁迅的小说，徐志摩、艾青的诗歌，曹禺的戏剧，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未必就不如古代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不只